

清史探秘

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 合
中国 文 化 报 社 办

甘肃捐监冒赈案

清朝第一大贪污案

倪玉平

过去甘肃的灾情报告总是“连年干旱”，不禁疑心大起：“该省向来年年报旱，何以今年雨水独多？此中有无蒙弊？”他觉察到甘肃年年报旱可能有诈，于是命阿桂等人仔细查办。

阿桂很快就查明，王亶望等人的“捐纳”，所收的不是粮食，而是银子。乾隆帝随即命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查讯在浙江家中丁忧(旧称遭父母之丧)的王亶望，又命接替王亶望出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赞呈报捐纳私收折色(中国历史上对原定赋税征收之财物称本色，改征其他财物称折色，清代折色专指银两)的情况。六月初，王廷赞上疏辩称，自己到任后，原不许折色，因无人报捐，只得照旧章办理；又担心粮价不一，所以统一规定，报捐者以55两为准。

六月初十日，乾隆帝指出，甘肃开捐，原本是收粮济赈，自应收取本色，岂能公然核定折收价格？如此重大之事，为何甘肃各级官员从无一人对朝廷提及？况且，所定55两银子的价格，表明该省的粮价并不算高，粮源充足，又何必赈济？三天后，陈辉祖报告说，王亶望承认在办捐过程中，确实听说过有折色一事，并曾就此事责备过属下，但考虑到收银后可以补购粮食，所以也就不了了之。乾隆帝不相信这种辩解。又过了四天，因阿桂再报“连遇阴雨”，无法采取军事行动，乾隆帝连下几

乾隆继位后，一改雍正严酷之风，施政主张宽严相济。但对于贪污，乾隆却一直严加惩治。乾隆三十九年(1774)开始的甘肃捐监冒赈案因贪污数量大、延续时间长、牵涉官员多、惩处罪犯严，被后人称为“清朝第一大贪污案”。

误用贪官，好事办坏

乾隆三十九年，陕甘总督勒尔谨以甘肃省土地贫瘠，时有灾荒，常需政府救济，奏请在甘肃实行捐纳，让无法考取功名而财力有余的人，向政府缴纳一定数量的粮食换取监生名号。捐纳之风从明清以来就一直盛行不衰。乾隆帝于四月十八日准勒尔谨之奏，并特意将“能事之藩司”王亶望调任甘肃布政使，负责捐监事宜。

王亶望赴任之后六个月，向乾隆帝报告了甘肃省的“捐纳”情况：目前已有19000余人前来捐纳，共收得粮食827500余石。看到奏折后，乾隆帝心有疑问：甘肃百姓向来贫穷，怎么会有近2万人前来捐监？开捐半年就收到粮食80多万石，年复一年，势必会无处存放，潮湿损坏，又该如何处置？不久甘肃回奏称，因为平定少数民族起义后，新疆与内地的商品流通日益发达，商人们获利颇丰，甘肃为商民必经之地，所以报捐者很多。而甘肃省雨水稀少，连年大旱，需要大量的粮食赈济百姓，所收监粮正好用于赈济百姓。乾隆帝一时也找不到破绽，便批示：“尔等既身任其事，勉力妥当可也。”乾隆帝没想到，王亶望所收“监粮”，竟全系纸上之数，仓库之中一粒末有，他所上报的“赈灾”粮食，也从未送到百姓手中。

骗局没有被揭穿，王亶望等人的贪欲愈来愈甚，上报的收捐数目也愈来愈多，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五月，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他所上报的“粮食”已多达600多万石，是甘肃省全年赋税的7到8倍。报捐人数和所收粮食数，不仅在甘肃省是空前的，就是在全国也名列榜首。同时，三年内甘肃省所奏报的“赈灾粮食”发放数额也多达600多万石。因为捐监有功，王亶望被提升为浙江巡抚。四十五年(1780)春，乾隆帝下江南，王亶望投其所好，竭力逢迎，大肆铺张，得到了好大喜功的乾隆帝的欢心，乾隆帝还赏赐王亶望之母御书匾额，以及大缎两匹和貂皮4张。此时的王亶望，官居从二品，是独领一方的封疆大臣，踌躇满志。

因雨生疑，顺藤摸瓜

乾隆四十六年(1781)三月，甘肃河州发生回民苏阿十三起义，乾隆帝派最为亲信的大臣阿桂前往平定。阿桂在上报军情的奏章中，多次提到由于当地雨水太多，官兵推进困难。乾隆帝回想



王新民

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地处鲁苏交界处，西连微山湖，南临陇海线，京杭大运河横贯东西，素有“山东南大门”之称。台儿庄的运河号子也称“粮米号子”，是船工在运河劳动中为了协调劳动动作，激发劳动热情，在同恶劣自然环境抗争的过程中，集体创作出的劳动号子，至今已传唱了数百年。

台儿庄区土城子地处运河沿岸，俗称“纤夫村”。自运河开通以来，村民就依托运河优势，以运河船务为生。据当地94岁的老船工徐德光说，运河粮米号子是乾隆年间专为官廷运皇粮时唱的，“金銮殿里也能撑一篙”。

运河号子是船工们在劳作时的即兴创作，船上有多少道操作工序，便有多少种运河号子，大体可归纳为打篷号、冲

号、打锚号、拉纤号、撑篙号、拿篙号等11种，每种号子又各有其作用。“打篷号”是船工们在船上搭建“使风”的“篷”时所唱的；“打锚号”是在铁锚久拖不起时，船工拔锚时所唱，铁锚在众人的齐声唱和中被缓缓拔起；开船后，船工们摇橹疲乏时，为缓解疲劳，便会大声唱“摇橹号”；“冲号”是在大船即将开航时唱的，船工大师傅将纤绳搭在肩上，先唱上一句给船上伙计一个信号——船要出发了，这时，伙计们无论在做什么，都要立刻起身，一边撤掉搭板，拿起竹篙，一边唱出“哎——”回应，继而进入工作状态，各司其职。大师傅再接着唱，众人再随号应和，一齐用力，如此反复三次，船便缓缓启动了。

不同唱调的运河号子，节拍也有所不同。撑篙号就有快拍和慢拍之分：逆水行舟时需用力撑篙，而且撑篙的节奏要加快，所以就用快拍号子；顺流航行时船只行驶平稳，撑篙不需大力，便可用慢拍号子。唱号子一般需要一位领号者，待领号者唱出，其他人随之应和。领号者要根据船舶行驶的状态，掌握号子的轻重缓急，以调动大家的情绪，把劲往一处使。

枣庄台儿庄运河号子是运河纤夫长期以来与大自然拼搏斗争留下的极具文化韵味的生产生活习俗，是前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种类繁多，节拍也各不相同，与河道上的万家渔火，笙歌管弦一样，成为运河沿岸的一大特色。

■文摘

一纸扇画 无穷回味

王德芳



扇面画(临宋人画)



《凭栏溪荷图》

炎炎夏日，一把扇子在手，可以引风纳凉。但它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在扇面上绘出物象，是中国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

扇画有上千年的历史，打开扇子，江山、竹石、花草、人物尽收眼前；折上扇子，一帘幽梦则慢慢逝去。“静”可观大千世界一草一木，一人一物，“动”可摇心中千思万绪、滚滚红尘。

唐代的扇子大都是圆形的，称

为团扇。日本奈良时代，团扇传入日本，后来日本人将之改良，变成折扇，宋时又传入中国。我们所说的扇画大多使用的是团扇和折扇，折扇画更多一些。

团扇在唐代极为盛行，一种礼仪之用，一种仕女专用。仕女用扇大多画一些美人花卉蝴蝶之类，为女子随身佩带。在日本奈良时代，团扇只供宫廷贵族专用，到平安时代才允许百姓使用。到了室町时代，在团扇上画日月星辰，在扇柄端缀上穗头，战争时可作为武将指挥的工具，与诸葛亮的“羽毛扇”类似，千军万马皆摇于羽扇之下，扇子在此有了特殊的意义。

折扇由日本传入中国(又有说由朝鲜传入中国)，人们喜爱她远远超过团扇。一把普通的扇子，经画家巧手经营，便成为艺术品。

唐代诗人罗隐的扇上面绘有牡丹：

为爱红芳满砌阶，教人扇上画将来。

叶随彩笔参差长，花逐轻风次第开。

闲挂几曾停蝶蝶，频摇不惯落蓂蓂。

根生天地如仙桂，疑是嫦娥月里栽。

一幅优雅的画面呈现在扇子上，令人回味无穷。

为什么古人对扇子上的画

青萝卜会始于元代，至今已有700余年的历史。北方民间流传“正月初九吃萝卜不牙疼、可防百病”的说法。正月初九恰在立春前后，因此每年的这个时候人们就卖萝卜、买萝卜、吃萝卜，当年的清溪庵庙会渐渐的被称为“萝卜会”。

改革开放后，为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弘扬民间民俗文化，山东青岛市台东区政府于1991年正月初九举办了第一届萝卜会，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欢迎。1994年，青岛市区规划调整，台东区、市北区合并，即为现在的市北区，萝卜会依然在每年正月初九开幕，至今已举办了19届。

萝卜会自举办以来，注重在内容和形式上突出时代特征，同时更注重体现民间民俗文化，每届萝卜会都以不同的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2008年青岛作为北京奥运会帆船赛举办城市，在萝卜会期间举办了一系列文化活动，如创办了“萝卜艺术雕刻大赛”，各路高手以手中的刻刀切磋技艺，雕刻出了“百鸟朝凤”“二龙戏珠”“雄鹰展翅”等栩栩如生

的萝卜雕刻作品，受到群众的赞叹；民间工艺品制作大赛包括了胶东半岛的民间剪纸、钩织、纸布贴画等广大群众可以参与的民俗活动，参赛者纷纷拿出看家本领，展示自己的技艺，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参与热情。

而作为萝卜会的重头戏，传统的萝卜雕刻艺术大赛每年都吸引了来自北京、上海、辽宁、安徽、湖南、河北等十多个省、市的参赛选

喜闻乐见的青岛萝卜会

杨洁

手展示绝技。其中，2008年萝卜会上，由10名雕刻大师用萝卜雕刻而成的长6.1米、高2.44米的作品《龙腾盛事迎奥运》耗费了4600斤萝卜，申报了吉尼斯世界记录。

随着群众参与越来越广泛，萝卜会集体闲、购物于一体的商贸形式受到了商家的欢迎，每届萝卜会都会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几百家商户进驻，如深受群众青睐的各种特色小吃，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遍享各地美食。

如今，连续举办了19届的萝卜会已经成为了青岛极富地域特色、民俗特色、群众参与性强的节庆文化品牌，被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授予“中国最具影响力民俗节庆”的称号，被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授予“最佳弘扬传统节日活动奖”。

青岛市市北区区政府在抢救和保护民间文化中采取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的办会方式，引导和发展具有当地民间特色的萝卜山会和传统的正月观灯闹元宵山会，将最初由群众自发组织的活动打造成为群众喜爱的集体闲、购物、旅游商贸、文化活动为一体的商贸山会，使这种民间群众活动成为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具有浓厚市北特色的文化品牌。多年来，市北区本着立足民间、依靠民力、凝聚民心、弘扬民俗、文明民风的宗旨，通过丰富多彩的节庆文化活动，彰显了特色市北的风貌，为百姓提供了喜闻乐见的文化大餐。



萝卜会上，参赛选手雕刻出精美的萝卜作品。

或字情有独钟？因为扇子已成为一种载体，手中之扇尽显儒雅和洒脱，文人雅士相聚时互相欣赏扇上字画，更能显示扇主人的艺术品位。文人雅士将斯文摇于扇上，大家闺秀将羞涩藏于扇下。唐代诗人王建中有“团扇，团扇，美人病来遮面”之语。以扇遮面，团扇与玉颜相映，借扇写出仕女的“病态美”。

扇画可随身携带，这一点满足了文人官宦对绘画的审美需要。一把素扇，一经书画便身价百倍。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就与扇子有一段佳话。《晋书·王羲之传》记载：有一次王羲之去一个村子，在集市上看见一位老婆婆拎着一篮子六角形的竹扇在叫卖，可无人问津，老婆婆很着急，王羲之对老人家说：“扇子是空白的，什么都没有，当然不好卖，不如我给你在上面写些字。”老婆婆心想反正也不好卖，看他有什么办法，就同意了。于是王羲之在每个扇子上草草写了些字，老人家看到还很不高兴，觉得字太潦草。王羲之说你就说上面的字是王右军写的。结果不一会儿扇子就全卖完了，价格还由原来的二十文涨至“百文”。

宋代花鸟画大行其道，扇画作为绘画的一种特殊形式被继承、发扬，已脱离了实用性，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

明代皇帝令宫廷定制一种有字画的扇子，五月初五日端午节赐给嫔妃和宫女。这种扇子一面由侍诏学士书写楷书诗词文句，另一面则由画师画上工细精美的图画。明永乐帝曾下令内务府大量制作扇面上有题诗赋词的佳品扇子，作为奖品赠给大臣，文人权贵也争相效仿。文徵明的扇画最突出，他的《万壑争流图》，在小小扇上千山万壑，气势宏大，画面紧凑，有着一般大尺幅山水画都难以达到的效果，是一幅咫尺天涯的好扇面。到了清代，有字画的折扇随处可见，可以说大部分书画家的作品中，都有一定数量的扇面画。近现代

的扇面作品多如繁星，其中齐白石的扇面作品就超凡脱俗，如他的《莲蓬藕》就有高度的概括力，与唐宋时期的扇面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摘自《中华文化画报》2009年6月刊)